

執拗的低音

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

王汎森著

執拗的低音

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

王汎森
著

執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
/ 王汎森著. -- 初版. -- 臺北市：允晨文化，
2014.03 面； 公分. -- (允晨叢刊；145)

ISBN 978-986-5794-15-6(平裝)

1.史學 2.文集

607

103002248

允晨叢刊 145

執拗的低音： 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

作 者：王汎森

發 行 人：廖志峰

責任編輯：楊家興

美術編輯：劉寶榮

法律顧問：邱賢德律師

出 版：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1號6樓

網 址：<http://www.asianculture.com.tw>

e-mail：ycwh1982@gmail.com

服務電話：(02)2507-2606

傳真專線：(02)2507-4260

劃撥帳號：0554566-1

印 刷：欣佑彩色製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裝 訂：聿成裝訂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日期：2014年3月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定價：280元

ISBN：978-986-5794-15-6

本書如有缺頁、倒裝，請寄回更換

目 次

序 5

執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 15

「心力」與「破對待」 73

王國維的「道德團體」論及相關問題 109

「風」——一種被忽略的史學觀念 139

附錄一 傳統的非傳統性——章太炎思想中的幾個面相 171

附錄二 時代關懷與歷史解釋 187

執拗的低音

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

王汎森 著

目 次

序 5

執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 15

「心力」與「破對待」 73

王國維的「道德團體」論及相關問題 109

「風」——一種被忽略的史學觀念 139

附錄一 傳統的非傳統性——章太炎思想中的幾個面相 171

附錄二 時代關懷與歷史解釋 187

序

二〇一一年三月，我應復旦大學之邀，擔任光華講座，進行四場演講。當初即言明講座的成果要集結成一本書。我最初的計畫是在講完之後，好整以暇，慢慢地將四篇文章寫出；然而演講之後，我雖曾寫過幾章，但是也有一部分只能退而求其次修改錄音稿。所幸復旦大學歷史系的博士生錢雲程度很高，提供了很大的幫助。這個講座的主題，事實上是我在接受復旦大學邀請時突然跳出腦海的。我當時覺得手中正在做的幾個研究，及一些對史學研究的視野及方法論的關懷，似乎都指向同一個方向，即「執拗的低音」。

一

何謂「低音」？由於這個書名是後起的，所以我採取的是非常寬鬆的定義。最初的設想只是想重訪近百年來被新派論述所壓抑下去的聲音，但是後來我決定將被忽略而仍具有重要性的思維方式、觀念等也包括進來討論。本文所說的「低音」大致是四個層面：一是省視被近代學術及思潮一層又一層複寫、掩蔽、遮蓋、邊緣化，或屬於潛流的質素。二是對歷史研究而言，「創造性轉化」與「消耗性轉換」的同一性，以及它對歷史研究造成「意義倒置謬誤」的現象。它還包括一些無所不在的學術框架，一些無所不在的假設——假設西方是普遍的，中國的歷史是個案的。三是方法或視野上面的問題，譬如

後見之明之類的思維如何影響我們的史學。¹四是一些長期以來被認為具有永恆性，在近代卻被長期忽略的主題。

這一個世紀以來，關於新舊思想的爭論，大部分都把「史實的重建」和「價值的判斷」混在一起。新派人物因為鄙棄保守派人物的思想，對他們的學術觀點也一概否定。保守派人物也常常反過來做同樣的事情。對於一個歷史學者而言，這兩者都不是健康的態度，值得重訪。當然這兩者之中，又以前者的情形更為嚴重。這一百年來，新派逐漸成為主流論述，舊派對於歷史文化的看法卻因其思想保守，而常常被連帶地掃到歷史的邊緣，成為被否定，或隱蔽的層面。

在這裡我要強調幾件事。第一、我個人的研究主題之一便是中國近代的新學術，我深深相信近代學問的進步，仍然以新學術之建立為主。譬如用西方嚴格的語言學知識對中國傳統的語言音韻學做出的創新，或如胡適（1891-1962）所說：「治國學必須要打破閉關孤立的態度」（《國學季刊》發刊宣言），都是非常好的例子。第二、作為一個史學工作者，我這次演講是從歷史研究的角度出發。在追求歷史真相的過程中，所有用得上的資源都是有益的，不管中西，也不管新舊。第三、我認為在近代思想發展過程中所造成的一些學術上的偏蔽之處，是到了應該「重訪」的時候。現在將這些問題解放開來，重新加以省視，是一個有益的方向，進而改變過去趨於兩個極端的舊視野。採取開放的態度，也有可能獲得新的現實資源。第四、不瞭解「低音」，就不能真正瞭解「主

¹ 談「後見之明」處有一部份原以〈對思想史研究的若干考察〉一文刊在《王元化先生九十誕辰紀念文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1）中，因與題旨相關，故收入本書第一講〈執拗的低音〉中。

調」，而且「低音」常常是可以輔助「主調」的。

新學的震盪其實是幫助人們「重訪」歷史。比如經過古史辨運動之後，出現了「疑古」、「釋古」、「考古」三派。如果沒有經過激烈的疑古，恐怕「釋古」、「考古」都不可能出現，不會注意到要先把先秦史書中的記載提起來抖一抖，再放下來重估其價值。沒有經過一番震盪，不可能平情地「釋古」、「考古」。現在很多人又毫不別擇地走回到「信古」，那也不是我的態度。舊派有可能因為太受仁義道德或「聖道王功」的影響而被嚴重地遮蔽，也可能處處為了把中國歷史傳統說成與西方相異，而掉入另一個陷阱，或是為了表示西方近代所有的，中國古亦有之，而反模仿了西方的近代，形成另一種扭曲。我的意見是要「重訪」，但不是要不經研究地復古，而是重新瞭解它的「正形」（套用傅斯年〔1896-1950〕在〈赤符論〉未刊稿中的話）——雖然這是不容易達到的。我的理解是人們往往要經過幾度類似現象學的還原工作之後，才能重新去掌握歷史文化的「正形」。

我之所以想要談「執拗的低音」，一方面是希望能檢視被近代激烈思想壓下去，或覆寫，或不斷擦拭之後殘留的文本，或是被暫時淹沒的觀念，同時也意識到，要檢討近代保守派的論述。事實上許多人因為反對新文化，而弔詭地「反模仿」西方，也就是說認為凡與西方或新文化相反的那一面便是中國傳統文化之本質，但事實上是以與西方或新文化對反的思維來定義傳統。所以我想像中的「重訪」當然也包括這一面。

因此本書中所宣揚的是陳寅恪所說的「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

告〉），為了做到這一點，本書所提倡的是「加法」，而不是「減法」，更不是退縮法——我不是要退縮回近代以前的舊論述，而是要在新史學所奠定的基礎上進一步求索。所以既不是「第一種」（趨新），也不是「第二種」（守舊），而是改變視野成為「第三種」。換句話說，正賴有近代的各種新學術的成績，我們現代人才有可能真正做到「重訪」。要真正把握「低音」，不是靠退縮回到過去，而是需要用世界上所有用得上的學問才可能撥雲霧而見青天。

二

從事歷史研究的過程中，我發現「時間序列」的問題變得非常重要，而它包括了許多方面。第一、我注意到創造轉化本身的消耗很大。當我們回過頭去看，會發現有些東西沒有被表述和彰顯，有些東西慢慢成為低音。例如梁啟超（1873-1929）說：「學案者，學史也」，這個說法當時風靡一時，被認為是對學案的新看法。可是現在回頭去看，梁啟超把生命的哲學轉化成為學術史後，其實把宋明理學中觀照生命的部分去掉了，很多東西都看不見了，只是在那裡尋求抽象的理論，這就是一種「消耗性的轉換」。

第二、「後見之明」作為一種歷史思考方式時所遇到的困難；還有我們歷史解釋中往往會設想歷史人物是處在「無限理性」的狀態下；提到我們該如何重新瞭解「風」，以及這種史學思維可能為歷史研究帶來何種的新養分；又如在新史學中，「歷史」與「意義」如何分道揚鑣；以及它為何仍是一個揮之不去的老問題。

第三、歷史中的行為、事物之間的關係，很難用我們目前的詞彙與概念完整描述。譬如歷史上兩種文化交遇時的關係，常如兩種不同顏色流質的互相暈染，可是現在好像沒有足夠的詞彙可以狀寫。古代的歷史、文化也是一樣，其中有許多複雜的情狀，恐怕不是我們現代的學術語言所能充分表述。更何況，我們所使用的許多學術語言是從日本或西洋次第借來的新詞彙或新觀念。這一百多年來，我們對知識的瞭解、定義、詮釋、範圍，大多是跟著新式教科書走的，就像突然一陣風吹來，人們的思維世界悄悄轉換成教科書或其他新書中的新定義、新概念，此後大家相沿而不自知，幾乎不再意識到其中有一個很複雜的歷史過程。

第四、我們的思維世界受到近代西方思潮的洗禮後，經歷了如大海潮般的變化，使得我們看待事物及資源之態度，有了一種深刻的轉變，譬如線性進化歷史觀的影響。在這些新的思維框架下，往往認為只有最當前的、最科學的、最進化的，才是最正確而有價值的。²

第五、主流論述研究的重要性當然不在話下，但我認為現在的我們也應該要注意到主流之外有第二、第三層次的潛流。我們觀察一片林相時，也必須注意大樹下面樹根的活動。主流與非主流的種種層次常同時疊壓在一起，形成競爭狀態，這裡面還有很複雜、很精微的相互依存關係。主流上升為主流的過程，往往有幾個層次的競合關係。因為我們習慣只見到主流，沒能用主流所能接受的語言來描述其他複雜的存

2 這好比在我們眼前有兩家書店，一家新書店，一家舊書店，新書店只賣最近出版或長銷書，舊書店賣的是過去六、七十年出版過的書，這兩種書店合起來才可能提供我們比較充分的參照資源。

在。我們對長在地上的樹很瞭解，兩棵樹可以看來毫不相關，可是我們忘了下面的樹根可能糾纏在一起了。³

三

重訪執拗的低音，也是在尋找多元的資源。「資源」是資源庫中的東西、是供選用的，而不一定就是一個確切的答案。就像我們住飯店，不必從一號房間開始住，下次住二號，再下次住三號。有用的資源，不是一個一個前後排隊般的發生關係，而是開放性的，充分承認歷史工作對古今思想資源的開發及思想資源的意義，而不是認定只有排在最當前的這一個才有現實意義，或是只有被打扮成與排在最當前的這一個一模一樣的歷史與思想，才具有現實意義。那麼歷史或思想史的工作將會豐富我們現實生活的資源。若我們想瞭解古代人物的狀態，則必須要設法與他們處於同一境地，不能只套西方的理論。我們應把西方歷史個案化、再普遍化，把中國的歷史文化個案化、再普遍化，在交復往返的過程中，得到新的理解與新的資源。

做完這四場演講後，有一位歐洲漢學界的朋友告訴我，他認為「低音」的問題，應該牽涉到三個層次，也就是「史實的建立」、「價值的參照」及「低音事實上可能才是真正的主流」。我並不完全認為低音才是真正的主流，但是同意前面兩者。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在重訪之後，使得新、舊各種學術資源成為並置的、多元的、開放的資源，而不是簡單地認為最新的、西方的學術見解才是唯一的、真正有價值的見解。所以這

³ 此處是用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1929-2007）「地下莖」（rhizome）的觀念。

種類似現象學的還原工作是一個解放。⁴這樣做並不是要取代主流，而是想要豐富資源的多元性。那些舊的、糾結不開的新舊文化之爭，應該隨著時代而新陳代謝，重訪的工作則能豐富我們對歷史文化的瞭解，同時也豐富今天的思想資源。

在演講中我也提到，西洋思想史上有過一些類似的例子。列奧·史特勞斯（Leo Strauss, 1899-1973）覺得十八世紀以來，西方受到「科學主義」與「歷史主義」的影響，忽略了古希臘、羅馬文本的許多深義。而維科（Giambattista Vico, 1668-1744）為了瞭解笛卡爾（René Descartes, 1596-1650）著作遮蔽的人的複雜性，花了二十多年的時間去瞭解古希臘羅馬。又如阿道（Pierre Hadot, 1922-2010）的 *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 認為現代人對古希臘哲學的研究，其實加上太多後代的框架，經過幾度抽離，那些帶有生命實踐的部分被遺忘了。經過阿道的重訪之後，我們更能把握希臘羅馬哲學中精微的複雜性，就像維科擺脫笛卡爾思維的影響，發現了古希臘思想中很多後人感到陌生的資源一樣。又如諾貝爾獎得主阿瑪迪亞·森（Amartya Sen, 1933-）的《倫理與經濟》中對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著作中「自利」與「競爭」觀念的探討，發現亞當·斯密對這兩者的主張都是有分寸的。透過阿瑪迪亞·森的重新審視，我們瞭解資本主義原來所聲稱的不是那麼簡單，則我們在考慮人類今天的經濟行為時，便可以

4 我一向認為同一時間的歷史發展是由多個層次構成的，有些是主調，有些雖然存在，卻成了低音。我們今日需要對這些「低音」進行「重訪」的工作，從問題遮蔽的那一面看主流與邊緣的分叉點。日本地震後所導致的核能危機，讓很多人想到，美國在上世紀六〇年代也曾經考慮要用熔鹽（molten salt）發電的方法來解決能源問題。現在慢慢有人想回到六〇年代的那個分叉點，看看究竟是為什麼岔出去了，並想瞭解熔鹽發電是不是一條新的出路，這便是一種「重訪」。

有一種新的視野。但究竟如何取捨應用，就不是歷史學者所能全然置喙的了。

最後我們要問的是，究竟解決當今人類困境的資源，只有當今西方的主流思潮，或是可能加上其他的資源？我時常感覺：「近代性」標榜多元化，但近代思想界的情狀卻顯得單元化。這個現象學還原式的「重訪」工作可能開啟了禁錮，顯豁潛流，使我們的思想資源多樣化、豐富化，能得益的不僅只是歷史解釋，它也可能開闊了現實價值的參照資源。那麼我們的價值世界就不再只是單線的、扁平的。

我必須強調，我從未改變我對近代新學術與新思想的前驅的敬意。文化不斷向前發展，新價值不停地創造出來，這是必然的事情，所以我不是在宣揚簡單的復古。我知道有一種富含政治性的復古思想正在崛起，有很多研究很強烈地希望朝著政治、國族的崛起的方向發展。不過我希望我的演講，不要跟這個趨勢畫上簡單的等號。我一直認為，我所談的這些「重審」的工作有一個前提，即未經過現代學術之洗禮，則所有學問不可能有進境，用王國維（1877-1927）的話說：「中西二學，盛則俱盛，衰則俱衰」（《國學叢刊》序），如果不經近代西方之一番震盪，對很多層面是視而不見的，沒有經過西方學說的引會，許多地方不甚清楚，或是雜亂無章，無法很有條理的表述等，不一而足。西方的理論、資源，常常能夠幫助我們好好瞭解古代歷史，而不一定會跟我們「重建」的目標互相排斥。例如李宗侗（1895-1975）先生寫了《中國古代社會新研》，還翻譯了《希臘羅馬古代社會史》，先不論他說的對不對，但他引用希臘羅馬社會中「家火」的觀念來解釋中國古代社會，的確為中國上古史的研究開啟一個新的面向。如果沒有

對古希臘城邦的深入瞭解，他就看不見中國古代史中的那一面。

最後我想再次強調，這本書原本規劃是演講集，但我一直想把它發展成論文集。然而最後因為時間所限，不能一一寫成論文，所以只能以現在的面目見人。因為是演講集，所以論點比較寬鬆，註腳也做得很少。在編輯的過程中，我加入兩篇文章做為附錄，分別是〈傳統的非傳統性〉（簡體字版《章太炎的思想》之導論）及〈時代關懷與歷史解釋〉（刊於《古今論衡》第 23 期）。另外，《上海書評》中有一篇我與葛兆光兄的對談錄（〈尋找「執拗的低音」〉），亦請讀者參考。

最後，我要感謝一群朋友。復旦大學的葛兆光教授、錢雲同學。尤其是葛兆光兄提出了這個邀請，並親自催稿，我要在這裡特別謝謝他。此外，也要感謝復旦大學的章清、周振鶴、陳思和教授在我演講期間為我主持講座，並提供了許多幫助。中研院的蕭高彥教授，林勝彩博士，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的譚徐鋒先生，臺灣大學歷史所博士生陳昀秀等，以及許多在講座過程中促成、幫忙的朋友，沒有他們，這本演講集是不能成書的。

王汎森 謹誌

2012 年 9 月

序

○.....

13